

---

 論著
 

---

# 《婦女雜誌》(1915-1931) 十七年簡史 ——《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sup>\*</sup>

陳 姪 澄\*\*

## 摘要

無論從發行期或影響力來看，《婦女雜誌》都可謂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婦女期刊，因此常被學者視為婦女史研究最基本的史料；並且由於五四時期該刊所呈現的激進論調與影響力的成長，前人經常認為此一時期的中國婦女論述經歷了高度成長。這類前人研究基本上假設史料空間背後的社會脈絡具有

\* 本文基本上是日本豐田財團 2001 年度獎助「《婦女雜誌》に見る近代中国女性 —— 東アジアの女性交流の視点から」研究 (D01-B1-102) 之部份成果，並曾於 2003 年 12 月 19 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婦女雜誌》(1915-1931) 所呈現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後依討論結果進行大幅修改，內容已與原日文版本有所差距。這一修改過程，作者特別要感謝評論人連玲玲女士的敏銳評語。此外，張朋園、呂芳上、游鑑明、潘光哲、周敘琪等諸位先進，以及其他未提出姓名的發問者惠賜寶貴意見，至為銘感。作者同時也感謝二位匿名審查人及編委會提供修正意見。另外，撰稿過程當中，承蒙友人許慧琦及孫慧敏的大力潤筆，謹此表示最衷心的謝意。同時聲明，文章若有任何問題和瑕疵，概由作者負責。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一貫性，但五四時期《婦女雜誌》的讀者、編輯者、撰稿者等所身處之社會脈絡，是否與五四前後具有連續性？其實仍有待驗證。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將先對《婦女雜誌》十七年的內容作全盤考察，並分析商務印書館與《婦女雜誌》的主編、執筆陣容及讀者間多層面的人際關係，來重建作為婦女史研究基本史料——《婦女雜誌》的社會脈絡。然後重新思考《婦女雜誌》的史料空間，究竟能否代表五四前後的中國婦女論述。《婦女雜誌》所呈現的婦女論述之水準，的確以五四時期為最高點，但這並不意味整個中國社會的婦女論述，也以五四時期為最高點。如果說早期的《婦女雜誌》是保守的男性主編叮嚀婦女們成為「賢妻良母」的刊物，那麼，五四階段的《婦女雜誌》則搖身一變，成為一群年輕知識分子討論婦女問題的園地。

**關鍵詞：**《婦女雜誌》、胡彬夏、章錫琛、商務印書館、編輯者、讀者

## 一、前　　言

近代中國所謂「婦女期刊」一類的刊物，以 1898 年 7 月在上海創辦的《女學報》為嚆矢，至 1949 年為止，先後已有 600 種以上的婦女期刊在中國發行，<sup>1</sup> 其數量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在眾多的婦女期刊中，《婦女雜誌》不僅發行時間長，<sup>2</sup> 發行量大、銷路範圍廣，<sup>3</sup> 更重要的是，它的影響力並不侷限於發行期間，而延續到停辦以後。

《婦女雜誌》之所以能夠與眾不同，最主要的因素是，發行處商務印書館從編輯到銷售各層面對該雜誌的支持。可是，這並不意味商務不顧一

1 徐楚影、焦立芝，〈中國近代婦女期刊簡介（1898-1918）〉，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卷 4，頁 680-681。

2 徐楚影、陳新段，〈婦女雜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卷 5，頁 351。

3 《婦女雜誌》的發行量詳見後述。至於銷路範圍，據版權頁所示，《婦女雜誌》除了由三十餘處國內各地的商務印書館分館分銷以外，還能從國外訂閱，由此可窺見其影響力的範圍。

切地支援《婦女雜誌》的成功。基於資本主義的企業經營觀，以追求銷售利潤為企業精神的商務印書館，<sup>4</sup> 在中國文化市場上始終擔當著雙重角色。一方面它不得不時刻考慮到商業利潤；但另一方面，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民營出版機構，又不得不自覺其文化建設的使命，盡量不失文化身分和文化品味。<sup>5</sup> 商務對於《婦女雜誌》的要求也不例外，一方面力求迎合讀者的需求，使《婦女雜誌》的內容能夠反映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則始終注視著文化界領導人士對《婦女雜誌》的評判。因此，《婦女雜誌》不同於其他僅代表某一種主義或主張的婦女期刊，<sup>6</sup> 它為了成為「暢銷書」，並迎合主流的文化價值，不得不充分地反映時代的潮流，而這也正是《婦女雜誌》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婦女最主要史料的原因。

到目前為止，學界對《婦女雜誌》本身史料性質的研究，不管在份量或深度上，都還相當不足，Jacqueline Nivard 的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i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及周敘琪所撰寫的《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是兩篇較具代表性的論著。<sup>7</sup> 前者雖然被認為是第一份針對《婦

4 汪家熔，《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頁37。

5 謝曉霞，〈商業與文化的同構——《小說月報》創刊的前前後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4期，頁199。

6 譬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主流婦女期刊，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革命派人士主持的《女子世界》或《天義》等，主要以鼓吹婦女解放為發刊宗旨。另一類是由小規模的婦女團體或女學校主持的《留日女學會雜誌》或《中國新女界雜誌》等，其主要目的為提倡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另外，1920年代以後的婦女期刊，多具有政黨機關報性質，如《婦女日報》或《婦女聲》等。由此可見，中國近代史上所謂婦女期刊，大多並非以銷售為主要發刊目的。

7 此外，據白露 (Tani Barlow) 指出，法文的研究成果還有，Chenshen Li 的 “Contribution A l'étude de la condition féminine en Chine: l'émancipation de la femme à travers quelques revues en langue Chinoise, notamment la revue ‘*Funiü zazhi*’ (*Journal des Femmes*), des années 1915-1929”，以及 Jacqueline Nivard 的 “Histoire d'une revue féminine Chinoise: *Funiü zazhi*, 1915-1931” 二篇學位論文，但是筆者至脫稿前仍未能得見上述兩篇大作。タニ・E・バーロウ，〈中国のフェミニズムにおける「女性」の問題——1920、30年代の優生学的言説——〉，《思想》，號949(2003年5月)，

女雜誌》全卷所作的綜合性論著，但是由於作者過度強調《婦女雜誌》在五四時期所擁有的影響力及其貢獻，因而使五四時期以外的《婦女雜誌》備受學界忽略。<sup>8</sup> 後者則主要以商務印書館的動向為其研究基調，分析《婦女雜誌》編輯方向的變化、主編的更迭，以及刊物的影響力等。不過，周敘琪幾乎沒有分析 1926 年以後開始逐漸脫離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影響的《婦女雜誌》；對於商務印書館的分析，也不盡然與《婦女雜誌》有直接的關聯性，只說明了當時商務印書館的大致狀況。總之，以此二者為代表的既有《婦女雜誌》研究，因為過於看重《婦女雜誌》在短短五年左右的五四時期主導當時先進婦女論述的角色，而忽略了其他十二年間的《婦女雜誌》所具有的意義，並使此後的研究者往往只從五四時期《婦女雜誌》上的部份進步論調，推論當時整個中國婦女意識的水準。

緣此，本文擬以《婦女雜誌》的全部發行期間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分析當時中國出版界及文化界的趨向，如何影響《婦女雜誌》的內容與編輯方針，另一方面則將討論涉及《婦女雜誌》的社會群體變化——包括編者、讀者或撰稿者。

## 二、創刊初期的《婦女雜誌》： 以賢妻良母主義為宗旨的婦女讀物

商務印書館籌備創辦《婦女雜誌》的具體過程，目前仍未能從文獻資料上得知。但有鑑於當時上海出版界正掀起一陣創辦婦女刊物的熱潮，如

頁 20-21。另外，Nivard 後來將其學位論文改寫成英文精華版本，也就是本文所參考的“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又，《The Ladies’ Journal》並不是後代學者賦予《婦女雜誌》的英譯，而是該誌在封面與版權頁上所註明的正式英文書名。

<sup>8</sup> 過去的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主要把《婦女雜誌》視為分析五四時期的婦女論述之資料。王政的作品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67-116.

1911 年有正書局創辦《婦女時報》、1914 年中華圖書館創辦《女子世界》、1915 年中華書局創辦《中華婦女界》，以及 1915 年廣益書局創辦《女子雜誌》等。可以想見，對於時常注意、關心同行動向的商務印書館而言，此一風潮可能是促使他們決定創辦一份以婦女讀者為對象的刊物 —— 即《婦女雜誌》—— 的因素。<sup>9</sup> 但是，商務的領導人們並沒有把這份雜誌看成代表商務的重要刊物，<sup>10</sup> 因此只要能確保一定程度以上的銷售利潤，其刊物的宗旨或內容，實際上都交由「婦女雜誌社」的主編及編輯部來決定。<sup>11</sup> 在《婦女雜誌》長達十七年的發行期間，除了受到兩次從文化界激烈攻擊 —— 1919 年羅家倫以及 1925 年陳大齊的批判 —— 而更迭主編以外，這份刊物幾乎沒有受到商務印書館經營陣容的干涉或操縱。

《婦女雜誌》創刊的 1915 年當時，中國正處於袁世凱統治時期，雖然名義上，在 1912 年由南京臨時政府所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了言論、著作以及刊行的自由，但是「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的另一條法規，<sup>12</sup> 實際上嚴重統制所有言論活動。辛亥革命以後，一時相當發達的中國出版界，因為當時對於言論及出版活動的嚴禁高壓，受了極大的打擊而

9 商務印書館經理兼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在其業務備忘錄中，專門設立「同業」欄目，詳細記錄中華書局等同業的動向。當中華書局停辦《中華婦女界》時，張元濟曾通告各分館「盡力推銷，無失機會」，商務印書館對《婦女雜誌》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卷上，頁 155。另外，汪家熔也指出，商務的期刊隨著中華書局辦期刊而增加。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張元濟、陸費逵、王雲五的文化貢獻》(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頁 196-197。

10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1897-1987) —— 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 116。另外，在《張元濟日記》裡也只有三件記事涉及《婦女雜誌》，且其內容都只在討論如何促進銷路。

11 《婦女雜誌》的編輯，則由「婦女雜誌社」來擔任。「婦女雜誌社」為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系統下的雜誌社之一。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 (1897-1992) —— 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 743。

12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章第六條第四項、第二章第六、第十五條。引自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頁 333。

萎縮。例如，1911 年時全國報紙總數達到 500 餘種以上，到 1914 年則僅剩下北京地區的 20 種、上海地區的 5 種而已，總發行量亦從 1912 年的 4,200 萬份，大幅減到 1914 年的 3,900 萬份。<sup>13</sup> 婦女刊物的情況也不例外，此類刊物的創辦數目在 1912 年一年之間達到 14 種，受到袁世凱政權的言論統制措施影響，1914 年僅餘 4 種，1915 年有 6 種，1916 年及 1917 年每年僅僅有兩種而已。<sup>14</sup>

上述出版界之衰退，不僅在銷售方面而已，還影響到刊物的編輯宗旨，而導致出版界質的變化。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刊物，多半都以主張婦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婦女參政權為其宗旨，1915 年發行於上海的《婦女時報》、《女子世界》、《中華婦女界》以及《女子雜誌》等刊物，卻若非以小說等文藝作品為主要內容，就是以培養婦女們在家庭生活當中所需要的衛生及家政等常識為宗旨。<sup>15</sup>《婦女雜誌》也不例外，劉璇的〈發刊詞二〉即呈現出當時婦女刊物的特徵：

吾國女子，自媧皇至今五千年，大抵養而弗教，禽息獸視，如渾沌未開之天地。一部廿四史中，女子之流芳百世者，曾不數十百人，如一線之曙光。近二十年中外大通，形見勢絀，乃知歐美列強縱橫於世界。非徒船堅礮利也。實由賢母良妻淑女之教，主持於內為國民之後盾也。起視吾國婦女依賴成性，失養失教，能不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耶。……自今日始，吾願吾婦女界之主持女教者，致力於衣食住之本原，以薄德育智育體育之教育全國。視國民之饑者，猶己饑之也。國民之溺者，猶己溺之也。吾婦女界夙秉慈善之天性，人之好善，孰不如我。合

13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 181-184。

14 「中國における女性向け新聞・雑誌一覧（1898-1937 年）」，引自前山加奈子，〈《婦女園地》とその「園丁」たち〉，《駿河台大学論叢》，號 7 (1993)。

15 例如《中華婦女界》創辦時指出，「本誌仿東西洋家庭雜誌、婦女雜誌辦法，為女學生徒、家庭婦女，增進知識，培養性靈。凡昔賢學說、女界美德，無不闡述而表彰之；而立身處事之道，裁縫烹飪之法，教養兒童之方，以及中外婦女之技術、職業、情形，悉為搜輯，以資模範，而供研究。」〈中華婦女界〉(廣告)，《中華婦女界》，卷 1 期 1 (1915 年 1 月)。

我全國婦女界二萬萬之心思才力，以婦女雜誌為機關，互換德智以求有益於吾國。則婦女雜誌之風行全國，顧不重歟。<sup>16</sup>

如〈發刊詞〉所述，創刊初期的《婦女雜誌》，「完全以提倡賢母良妻為主，旁及婦女醫藥衛生和撫育兒童的常識等等」，「仿當時一般期刊的體裁，刊載一些小說或彈詞等。」<sup>17</sup>

自創辦當初到 1920 年為止，也就是第 1 卷至第 6 卷的《婦女雜誌》，由王蘊章 (1884-1942) 擔任主編。王蘊章以鴛鴦蝴蝶派小說家馳名，<sup>18</sup> 他也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小說月報》的主編，同時用「蓴農」、「西神」、「王蓴農」以及「王蘊章」的筆名，把自撰的小說等文藝作品及譯稿刊登於《婦女雜誌》上。但是從其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做為主編的王蘊章並沒有直接引導此刊物的宗旨，或至少沒有做代言人的角色。王蘊章擔任主編六年當中的投稿，在「小說」欄目有 10 篇、「雜俎」有 26 篇、「餘興」有 19 篇、「學藝」有 32 篇、「家政」有 38 篇，以及「記述」有 18 篇等。不僅並未在「論述」以及「社說」等引導刊物性質的欄目上發言，而且除了「小說」欄目以外，署名為王蘊章的文章，多半是譯自《美國母範雜誌》(原名：*Ladies' Home Journal*) 或《日本婦人世界》(原名：《婦人世界》) 的中譯稿罷了，由此可見王蘊章與《婦女雜誌》的關係。

此一段期間，在 1916 年第 2 卷的《婦女雜誌》曾聘胡彬夏 (1888-1931) 為名義上的主編。<sup>19</sup> 胡彬夏做為主編的角色，明顯不同於王蘊章。胡彬夏擔任主編的訊息，不僅在《婦女雜誌》，也在其他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刊物上登出廣告，可知期待她的名聲能帶來宣傳的效果，進而擴大銷路，是使

16 劉璣，〈發刊詞二〉，《婦女雜誌》，卷 1 號 1 (1915 年 1 月)。

17 謝菊曾，《十里洋場的側影》(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頁 38-39。

18 關於王蘊章個人的經歷以及文學作品，參見芮和師，〈以詞章擅場的小說名家——王西神評傳〉，收入樂梅健編校，《哀情巨子——鴛鴦派開山祖——徐枕亞》(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

19 謝菊曾，《十里洋場的側影》，頁 38。由胡彬夏擔任主編的第 2 卷之《婦女雜誌》，可見由她撰寫的社說或對於美國婦女生活的見聞。另外部份論者認為，胡彬夏當時扮演過名符其實的主編，「執編期間突破了原有風格」。參見曹正文、張國瀛，《舊上海報刊史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 25。

商務印書館延攬當時「女界明星」胡彬夏擔主編之責的一個因素。<sup>20</sup>

胡彬夏是中國最早期的女子留學生之一，曾經在日本（1902-1903，實踐女子學校）以及美國（1907-1914，Wellesley College）受過大學教育，<sup>21</sup> 這也是身為「女界明星」的她與眾不同之處。但是，胡彬夏除了代表此類受過教育的新式知識婦女形象以外，還扮演了另一種婦女形象：「愛國女子」。1902 年 6 月，胡彬夏以年僅十四歲的少女身分赴日留學，就讀於實踐女子學校。<sup>22</sup> 當時留日中國女學生，大部份出身上流家庭，多就讀於下田歌子（Shimota Utako, 1854-1936）所主持的實踐女子學校。<sup>23</sup> 這群女學生一方面受下田所提倡的「賢妻良母主義」教育訓練，同時也關心祖國所面臨的政治危機，先後創立「共愛會」、「留日女學生會」以及「女子復權會」等愛國組織，扮演女子革命志士的角色。<sup>24</sup> 胡彬夏亦可謂其代表性人物，曾參加「共愛會」，並為當時留日女學生愛國運動的中心人物。<sup>25</sup>

換言之，胡彬夏所呈現的另一種婦女形象，不外乎是能貢獻於國家富強的婦女。《婦女雜誌》早期的主要內容，除提供衛生以及家政知識等源自歐美的新知之外，另外則是登載傳奇、彈詞以及小說等中國傳統的文藝作品，提醒婦女們應遵守中國傳統規範。當時《婦女雜誌》呼籲中國婦女們應成為「賢妻良母」，根據科學新知來主持家政，此為婦女們貢獻國家富強的唯一之道。《婦女雜誌》之所以起用胡彬夏，從該刊物的宗旨審視

20 〈美國惠爾斯來大學校學士無錫朱胡彬夏女士編輯婦女雜誌大改良廣告〉（廣告），《婦女雜誌》，卷 1 號 12（1915 年 12 月）。

21 1901 年設立的日本實踐女子學校正式招收中國留日女學生，次年 6 月胡彬夏等 8 名第一批女留學生赴日就讀於該校。胡彬夏回國後，1907 年 6 月再次考取江蘇省舉行的留學生考試，赴美惠斯來大學學習。見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及其活動與影響〉，《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1999 年 8 月），頁 66、69。

22 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273。

23 參見〈大陸發刊之辭〉，《大陸》，期 1（1902）。

24 鮑家麟，〈晚清及辛亥革命時期〉，收入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 121-122；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及其活動與影響〉，《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頁 67。

25 參見〈留學界：三山採藥〉，《女學報》，期 4（1903）；胡彬夏，〈祝共愛會之前途〉，《江蘇》，期 6（1903）；胡彬【夏】，〈論中國之衰弱女子不得辭其罪〉，《江蘇》，期 3（1903）。

之，是為了向讀者出示一個能象徵發刊宗旨的實際人物，同時也期待她能帶來的宣傳效果。<sup>26</sup>

早期的《婦女雜誌》，因為編輯方針能迎合當時以「賢妻良母主義」為宗旨的女子中等教育，<sup>27</sup> 經常被視為值得推薦給女學生的模範讀物之一。<sup>28</sup> 1919 年五四運動之前，《婦女雜誌》每期大約有 3,000 份左右的銷售量，應該是多由這些女學生支持。<sup>29</sup> 但是 1919 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潮流逐漸成熟，《婦女雜誌》創辦初始所標榜的賢妻良母主義，與《學生雜誌》、《教育雜誌》等由商務印書館所發行的其他主要刊物，共同受到強烈的攻擊與批評。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進步思潮的觀點來看，從前的《婦女雜誌》只不過「專說些叫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罷了。<sup>30</sup>

我從前在嘉興女子師範裡，修身一科的結晶體是「服從」和「敬順」，又有什麼「賢妻良母」、什麼「三從四德」，時時要接觸著我的耳鼓。商務印書館的《婦女雜誌》，也是脫不了這個主義。<sup>31</sup>

至此，為了應付新時代讀者們的需求，《婦女雜誌》只能放棄以往「賢妻良母主義」之編輯宗旨，並試圖變身，成為能吸引五四青年知識分子的讀物。

26 1915 年前後，胡彬夏曾發表文章於其他多種婦女刊物，但是 1916 年擔任《婦女雜誌》主編以後，不再投稿於其他同類刊物。這也從旁佐證，商務印書館起用胡彬夏，是為了吸引其他婦女刊物的讀者。參見胡彬夏，〈美國胡桃山女塾之校長〉，《女子雜誌》，卷 1 號 1 (1915 年 1 月) 等。

27 趙淑萍，〈民國初年的女學生 (1912-1928)〉(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27-35。

28 梅夢，〈女學生自習用書之研究〉，《婦女雜誌》，卷 1 號 5 (1915 年 5 月)；陳亦秦，〈余之學校生活〉，《婦女雜誌》，卷 1 號 11 (1915 年 11 月)。

29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 37. 另外，1910 年當時銷量最多的刊物《東方雜誌》，每期銷售數達 15,000 份，從此可推測《婦女雜誌》當時影響力的程度。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4)，甲編，頁 86；楊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頁 52。

30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卷 1 期 4 (1919 年 4 月)。

31 王會吾，〈中國婦女問題 — 圈套 — 解放〉，《少年中國》，期 4 (1919 年 10 月)。

### 三、五四時期的《婦女雜誌》：追求婦女解放

到 1919 後半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終於猛烈衝擊著商務印書館。1919 年至 1925 年間，由商務印書館刊行的主要雜誌類，如《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以及《小說月報》等等，不僅被攻擊為「腦筋混沌」，<sup>32</sup> 銷售量也開始下降。<sup>33</sup> 這些時代趨勢迫使商務印書館認知到改革的確實必要性，<sup>34</sup> 1919 年以後為進行上述雜誌的改革，不僅採用白話文，還起用一批新知識人物，使編輯群令人耳目為之一新。<sup>35</sup>

《婦女雜誌》也不例外地改頭換面。從 1919 年 11 月該刊上所登載的社論中，可見以主張婦女解放做為此後改革的方向。<sup>36</sup> 同年 12 月，該刊除了正式宣布此後編輯方針的變化之外，<sup>37</sup> 1920 年 1 月並公布採用白話為該

32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卷 1 期 4。

33 據 1918 年度的調查，該館全部雜誌的銷售額為 111,000 元，不但沒有比上一年增加，反而減少 35,000 元。並且據 1919 年 3 月的報告，歷年滯銷雜誌已超過 110,000 份。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卷下，頁 505、551。另外，正如《小說月報》，各項雜誌也因銷售量的逐漸減少而困擾。茅盾，《我走過的道路》（香港：三聯書店，1981），頁 140。

34 例如，在 1917 年張元濟即已認為《小說月報》「不適宜，應變通」。見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頁 144。另外，他在 1920 年 2 月 3 日的日記云：「現在各省自編教科書，又新思潮激進，已有新婦女、新學生、新教育出版。本館不能一切迎合，故今年書籍不免減退。應當注重印刷、力求進步。」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卷上，頁 709。另外，從《東方雜誌》的改革過程亦可知，當時面對新知識分子的抨擊，商務只能對自己刊物進行全般的改革。若林正丈，〈近代中国における綜合雑誌 —《東方雜誌》解題—〉，《外国语研究紀要》（東京大学教養学部），卷 26 號 4 (1978)，頁 16-34。

35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1897-1987)》，頁 111；戴仁（Jean-Pierre Drege）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1949》（*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 111；胡愈之，〈回憶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 (1897-1992)》，頁 123-124。

36 佩韋，〈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婦女雜誌》，卷 5 號 11 (1919 年 11 月)。

37 記者，〈本雜誌今後之方針〉，《婦女雜誌》，卷 5 號 12 (1919 年 12 月)。

刊正式文體。<sup>38</sup>

我們以為女子問題也應當用著中態度去研究，我們應當一面挂起「女子解放」的大目的，去提倡，一面要暴露現在社會的弱點，解放的不可能處，實行問題的質難，這才是。否則，只用動人的感情的話，天天刺激女子的心，鼓吹，卻不量量女子的實力如何，真正的程度如何，就使勉強做到了和理想形似的模子，正如「繁華巢梗」，總有一天欲鬧亂子，一敗到地。這不是解放女子，簡直是害了女子！同時也害了社會全體！我們是抱定這穩健宗旨的，所以婦女雜誌此後得眼光，一面提倡女子解放，一面卻要十二分審慎周詳的去批評女子解放運動中的言論和行動。須知這不是自相矛盾，我們對於社會改造問題，是應該如此的。<sup>39</sup>

但是如上所述，改革當初的編輯群態度較傾向於穩健，主張真正的婦女解放則須基於婦女們自己的改造，對於婦女解放運動本身卻保持批判的立場。<sup>40</sup> 改革的真面目，須等到 1921 年章錫琛接替王蘊章擔任《婦女雜誌》主編以後，<sup>41</sup> 才能得見。當同時兼任《小說月報》、《婦女雜誌》的主編

38 梅，〈解放與建設〉(廣告)，《婦女雜誌》，卷 6 號 1 (1920 年 1 月)。並次號起讀者徵文也「文字以用白話者為宜」。〈婦女雜誌社徵文廣告〉，《婦女雜誌》，卷 6 號 2 (1920 年 2 月)。

39 記者，〈本雜誌今後之方針〉，《婦女雜誌》，卷 5 號 12 (1919 年 12 月)。

40 同樣的編輯方針，可見於瑟廬，〈婦女之解放與改造〉，《婦女雜誌》，卷 5 號 12 (1919 年 12 月)。

41 章錫琛 (1889-1969)，字雪村，筆名方可、高勞，浙江省紹興縣人。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十七歲進「東文傳習所」學習日文；翌年入私立中學「通藝學堂」，之後又就讀「山會簡易師範學堂」，並在十九歲時開辦「育德堂」，從事教育工作。1912 年 1 月，他到上海，進入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社」工作後，從此展開編輯生涯。在 1921 年轉為《婦女雜誌》主編之前，主要擔任《東方雜誌》的日文中譯工作。李立明，〈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香港：波文書局，1977)，頁 380-381；魯迅，〈兩地書〉，《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卷 9，頁 371；章士駁，〈章錫琛先生傳略〉，收入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上海：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頁 172；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 (1931 年 1 月)。

王蘊章辭職時，商務印書館原本擬請茅盾（1896-1981）同時接任此二刊物的主編，<sup>42</sup> 但因茅盾只接受《小說月報》主編之務，所以《婦女雜誌》編輯部自 1921 年 1 月起由章錫琛負責。章錫琛日後回憶當年擔任《婦女雜誌》主編之始末時表示：

《婦女雜誌》，1915 年創刊，也是被羅家倫指名大罵的刊物之一，以前在王尊農主編時，卻借用朱胡彬夏的名義。她是上海私立大同大學校長胡敦復的妹子，曾在美國留學，商務想借她的聲望吸引讀者。王尊農去職後，一時找不到人，錢經宇推薦我去充數。我因為這方面毫無研究，不敢輕易擔任，經錢經宇再三督促，才勉強應允。商務對這雜誌一向並不重視，只求換一個人，把提倡三從四德、專講烹飪縫紉的老調變換一下成就，所以只加修改充數，一面四處拉稿，又在雜誌上出題徵文，再不夠自己也寫一些，只求能盡快編好。過了三個月，總算把積壓的各期趕出。當時在北京的友人周喬峰（建人），常常應我的要求寄來不少稿件，有些是他自撰，有些託人撰寫。<sup>43</sup>

由此可知，商務印書館對《婦女雜誌》主編人選的主要考量，並非此人是否為婦女問題的專家，而章錫琛之所以雀屏中選，也不是因為他們認為章氏在婦女問題方面有成就或研究。實際上，章錫琛在擔任《婦女雜誌》主編之前，幾乎沒有接觸過西方婦女思想。<sup>44</sup>

42 茅盾，〈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後〉，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1897-1987）》，頁 189-190。另外，茅盾在《婦女雜誌》，除了本名「沈雁冰」與「雁冰」以外，還使用「佩韋」的筆名。謝菊曾，〈十里洋場的側影〉，頁 39；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p. 78.

43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1897-1987）》，頁 116-117。

44 章錫琛在進入商務印書館之前，曾任教於「明道女子師範學堂」，這可能是他擔任《婦女雜誌》編輯工作前，唯一和婦女有關的活動。前山加奈子，〈女性刊行物全体からみた《婦女雜誌》—近現代中国のジェンダー文化を考える一助として—〉，收入村田雄二郎主編，《『婦女雜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東京：研文出版，2004）。當時章錫琛除了「擔任國文及教育學的教科」之外，還負責該校的行政事務。他之所以到該校任職以及後來的離職，主要並不是因為個人的思想因素，而是

這一年，擔任《小說月報》兼《婦女雜誌》的主編王尊農先生辭職；沈雁冰先生接任《小說月報》主編，《婦女雜誌》卻還沒人接任。後來經過錢智修先生的推薦，叫我去接受。我當時還不敢答應，最後錢先生允許給我幫忙，我才勉強承認下來。那時正當新思潮運動極盛的時期，婦女問題為一般人所注意，我感覺到在《婦女雜誌》中非討論到婦女問題不可。但一向對這問題沒有研究，只得臨時抱佛腳，到東方圖書館裡找出幾本日文書籍來，生吞活剝地來介紹一點。後來我請到一位有力的幫手周建人先生來共同編輯，於是這類的文字漸漸增多。<sup>45</sup>

從章錫琛的回憶中可以看出，他在擔任《婦女雜誌》主編之前，即使認同婦女問題的重要性，卻尚未抱有任何確定的思想。不僅章錫琛如此，就連共同編輯人周建人也並非以研究婦女問題為本行。<sup>46</sup> 換言之，五四時期的《婦女雜誌》，與其說是被章錫琛等編輯者所抱持的思想引導，毋寧說是編輯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中摸索婦女問題的產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當中，章錫琛確實扮演過引導婦女解放思想的重要角色，<sup>47</sup> 但這並

基於人際關係的考量。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 (1931 年 1 月)。由此可知，他在女子師範的教學活動和他的婦女思想並沒有密切關係。

45 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 (1931 年 1 月)。

46 周建人 (1888-1984)，乳名杉壽，筆名喬峰、高山、嵩山，浙江省紹興縣人，是魯迅的三弟。他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回國後，於 1921 年到商務印書館擔任生物學教科書編輯。抗戰勝利後，他參加馬敘倫（浙江省杭州人）、許廣平（廣東省番禺縣人）等所組織的上海民主促進會。1949 年，由上海赴香港，再轉至北京，於中共建政後，被任命為政務院出版總署副署長兼該署編審局副局長。李立明，〈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頁 194。周建人早年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活動，並非以婦女方面為主，1925 年和章錫琛一同離開《婦女雜誌》，被調到主編《自然界》雜誌。張明養，〈悼念周建老〉，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 (1897- 1992)》，頁 227-230；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1897-1987)》，頁 117。

47 章錫琛在五四時期所從事的有關婦女的活動，以出版與編輯工作最具影響力。他在擔任《婦女雜誌》主編時，不僅同時編輯其他婦女刊物，如《現代婦女》（《時事新報》副刊）及《婦女週報》（上海《民國日報》副刊），還組織了「婦女問題研究會」。而在離開商務印書館後，他又創辦了《新女性》等刊物。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 (1931 年 1 月)。

不意味五四時期的《婦女雜誌》就是被他的婦女思想所引導；相反的，他其實是因為《婦女雜誌》的編輯經驗，才認識並學習到這些婦女思潮。總而言之，五四時期的《婦女雜誌》所呈現的，並不是一個領導者如何把西方婦女思潮成功地在中國傳佈的過程，而是當時的新知識分子們如何認識、學習新思潮，並檢討其如何適用於中國的過程。

雖然章錫琛並未指出婦女界未來的走向，但在 1921 年 1 月至 1925 年 8 月間，《婦女雜誌》確實因為章錫琛的主導，在當時中國關於婦女問題的出版物中，坐上第一把交椅。<sup>48</sup> 那麼，我們如何從五四時期的《婦女雜誌》版面，認知章錫琛引導當時青年知識分子認識婦女問題的具體過程？以下筆者將以筆名辨別為核心，嘗試探討章錫琛在《婦女雜誌》中的表現。

1921 年以後，《婦女雜誌》的撰寫者，除了上述的周建人與茅盾以外，還包括魯迅、周作人、蔣鳳子以及吳覺農等人，皆為代表五四新思潮的新式知識分子。但是由於他們經常使用筆名，因此諸多文章不能確定其作者，甚至還無法判明性別。另一方面，章錫琛署名的文章，除了以主編名義刊登的「通訊」欄目之外，僅有 5 篇，如 1923 年的〈讀鳳子女士和 Y.D.先生的討論〉（卷 9 號 2）、1924 年〈婦女問題十講譯者序〉<sup>49</sup>（卷 10 號 8）以及 3 篇社說。<sup>50</sup> 但據章錫琛日後回顧，當時《婦女雜誌》諸多文章，都由周建人與章錫琛二人撰寫。至於譯稿部份，章氏更進一步指出，周建人及他分別擔任英文與日文的選譯工作；<sup>51</sup> 其中周建人所翻譯或撰寫的文稿，皆能確認於第 7 卷第 5 號起的《婦女雜誌》上。當時周建人除了採用「周建人」與「建人」的原名以外，還使用「喬峰」、「高山」以及「克士」等多種

48 梅生，〈讀婦女雜誌的感想〉，《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1921 年 6 月 5 日。

49 1924 年，章錫琛將日本本間久雄的《現代之婦人問題》（東京：天佑社，大正 8 年）中譯，而由婦女問題研究會出版。本篇〈譯序〉即介紹此一新書。參見〈附錄〉，《婦女雜誌》，卷 10 號 8（1924 年 8 月）。

50 章錫琛，〈國民會議與女國民〉，《婦女雜誌》，卷 11 號 5（1925 年 5 月）；章錫琛，〈女學生的人生觀〉，《婦女雜誌》，卷 11 號 6（1925 年 6 月）；章錫琛，〈今後婦女運動的方針〉，《婦女雜誌》，卷 11 號 7（1925 年 7 月）。此三篇，則受到商務印書館開始審查的影響，其論調明顯地轉為穩健。詳細內容見本文第三節。

51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1897-1987）》，頁 116；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1931 年 1 月）。

筆名，<sup>52</sup> 每期有多達 5、6 篇的英文譯稿登載於《婦女雜誌》。由此推測，雖然沒有找到以章錫琛為署名的譯稿，但是與周建人的情況一樣，章錫琛也很可能將自己的譯稿，以筆名登載。

另一方面，1920 年至 1925 年之間，《婦女雜誌》有不少譯文是介紹日本婦女界的情況或思想等，這些譯作的作者分別以「Y.D.」、「瑟廬」、「幼雄」以及「幼形」等筆名出現。<sup>53</sup>

尤其「瑟廬」的筆名，早在王蘊章主編的 1918 年已經開始於《婦女雜誌》出現，也就是茅盾的筆名「佩韋」初次見於該刊之時點。<sup>54</sup> 如前所述，商務印書館原本擬以茅盾為《婦女雜誌》主編，因茅盾只接受《小說月報》

52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1897- 1987)》，頁 116；曾健戎、劉耀華編，《中國現代文壇筆名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頁 262；張明養，〈悼念周建老〉，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 (1897-1992)》，頁 228。另外，周建人撰寫的文稿篇數 (1921-1925) 見下表。

	喬峰	周建人	建人	高山	克士
1921 年第 7 卷	1	3			
1922 年第 8 卷	7	6	3		
1923 年第 9 卷	3	2		21	24
1924 年第 10 卷	1	1	1	12	3
1925 年第 11 卷	1	5	4	9	

53 另外，這些筆名按文稿的性格分別利用，如「Y.D.」用於婦女論述，「瑟廬」用於婦女界的動向，「幼雄」及「幼形」則用在「世界珍聞」與「科學談屑」等娛樂性的讀物。譯自日文的文稿篇數 (1920-1925) 見下。

	Y.D.	瑟廬	幼雄	幼形
1920 年第 6 卷		10		
1921 年第 7 卷	6	3	9	
1922 年第 8 卷	11	9	4	7
1923 年第 9 卷	6	5	5	
1924 年第 10 卷	3	1	6	
1925 年第 11 卷			3	

54 以「瑟廬」筆名為署名的 1920 年之前的記事，有〈產死兒救護新法〉(《婦女雜誌》，卷 4 號 7)，以及〈婦女之解放與改造〉(《婦女雜誌》，卷 5 號 12) 二篇。

主編之任，章錫琛成了商務的第二人選。1912 年以日文翻譯記者身分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章錫琛，1919 年起從事於《東方雜誌》的編輯工作，<sup>55</sup> 他很可能另參與同樣處於編譯所內的「婦女雜誌社」的編輯。1925 年 1 月，章錫琛的〈新性道德是什麼〉一文遭到北京大學知名教授陳大齊嚴厲批評，<sup>56</sup> 商務印書館因此開始在出版前審查《婦女雜誌》的清樣。而章錫琛則開始以本名來撰寫較穩健論調的論說，同時，「Y.D.」、「瑟廬」、「幼雄」以及「幼彤」等筆名均從該刊中消失。由這些現象看來，可以初步判定這些可能都是章錫琛的筆名。<sup>57</sup>

綜合上述，可以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的青年新知識分子，是以章錫琛為核心，共同推動《婦女雜誌》的改革，從而展開其言論活動。接下來，筆者將進一步說明章錫琛所主導的改革內容，以展現五四新知識分子如何認識並討論有關婦女的新思潮。

《婦女雜誌》編輯宗旨的改革，雖然早在 1919 年 12 月便見其片斷，但直到 1921 年章錫琛出任主編之後，才開始漸趨明顯。此後《婦女雜誌》一改以往的保守論調，搖身一變，成為以「謀婦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為發刊主旨的讀物。<sup>58</sup> 改革方向穩定下來的 1922 年以後，進一步將有關家政以及衛生等實用新知的版面大幅減少，此後《婦女雜誌》名符其實地成為專門討論婦女問題的刊物。<sup>59</sup>

55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p. 45, 53.

56 此一細節，在本文第四節待為後述。

57 另外，王政也指出「瑟廬」為章錫琛的筆名，但是並沒有加以說明其證據所在。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pp. 87, 89, 95. 另外，由章錫琛所主導的「婦女問題研究會」所編輯的《現代婦女》（《時事新報》副刊），發刊詞作者也署名為「瑟廬」。瑟廬，〈新良妻賢母主義〉，《現代婦女》，創刊號（1922 年 9 月）。根據章錫琛日後的回顧，他也為《現代婦女》「寫一點肆無忌憚的文字」，但在該刊中並沒有署名為「章錫琛」的文章，僅有以「瑟廬」署名的發刊詞而已。這也是支持「瑟廬」可能是章錫琛筆名的旁證。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 (1931 年 1 月)。

58 〈編輯餘錄〉，《婦女雜誌》，卷 7 號 2 (1921 年 2 月)。

59 另外，章錫琛時代的《婦女雜誌》並不只在內容方面進行改革，從第 7 卷，其定價也降為原來的三分之二（每冊二角），伴隨著此一減價措施，印刷文字也變小。〈編

五四時期，《婦女雜誌》有關婦女問題之討論，多半基於西歐或日本等先進國家的婦女解放理論而發，如易卜生 (Henrik Ibsen, 1828-1906)、倍倍爾 (August Bebel, 1840-1913)，以及愛倫凱 (Ellen Key, 1849-1926) 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受到這些來自西方的婦女理論之影響，當時的《婦女雜誌》特別注重自由結婚、自由離婚、獨身問題、貞操問題、生育節制，以及性道德等問題。這些有關社會性別的課題，在過去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被如此熱烈地討論過，<sup>60</sup> 如今不僅開始公開深入討論，《婦女雜誌》甚至出版專號，如「離婚問題號」(卷 8 號 4)、「產兒制限號」(卷 8 號 6)、「婦女運動號」(卷 9 號 1)、「娼妓問題號」(卷 9 號 3)、「家庭革新號」(卷 9 號 9)、「配偶選擇號」(卷 9 號 11)、「職業問題號」(卷 10 號 6)、「男女理解號」(卷 10 號 10)，以及「新性道德號」(卷 11 號 1) 等，以呼籲當時五四知識分子注意性別問題。

除了婦女及性別問題等理論方面的討論，此時《婦女雜誌》還特別關心國內外時事與有關婦女界的動向，並迅速向讀者報導。譬如，當蘇俄革命時，曾陸續登載一連串相關報導；或配合 1922 年刪格爾夫人 (Margaret Sanger, 1879-1966) 訪華，籌備出版「產兒制限號」。換言之，五四時期的

輯餘錄》，《婦女雜誌》，卷 7 號 2 (1921 年 2 月)。

60 以整體中國婦女論述而言，這些性別論述，早在戊戌辛亥時期就曾經被提出討論。但在戊戌辛亥時期，這些論述強調的是救亡圖存的政治目標，而五四時期的性別論述所宣揚的主旋律則是人格獨立和權利平等，顯然要比前一個世代更趨近於國外的新思潮。呂美頤、吳效馬，〈婦女解放思潮的興起與發展〉，收入吳雁南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 1840-1949》(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卷 2，頁 688-689。在五四時期的《婦女雜誌》上所登場的性別論述也不例外。章錫琛日後回顧《婦女雜誌》編輯云：「他（周建人）到上海和我住在一起，彼此共同商討改進的方針，方向逐漸明確，來稿也逐漸增多。周建人能翻譯英文，我也學過一點日文，曾經在《東方》幫助翻譯，兩人就從圖書館借來幾種有關婦女問題的英、日文書，共同翻譯，自己也東拼西湊寫些提倡婦女解放和戀愛自由一類時髦的短文。」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1897-1987)》，頁 116-117；另參見本文頁 13 之引文。由此可見，原本對於婦女問題一所無知的《婦女雜誌》的編輯群，其訊息來源並不是前輩知識分子的論述，而是英、日文書籍。也就是說，他們的婦女論述，並沒有繼承過去在戊戌辛亥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所進行的相關討論。

《婦女雜誌》並不是紙上談兵的理論性刊物，它還試圖從時事方面去理解實際的婦女問題，以免流於純理論性的探討。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婦女雜誌》相當重視編輯人與讀者之間的溝通，經常設定專題向讀者徵文，<sup>61</sup> 並開闢「讀者俱樂部」、「自由論壇」、「讀者文藝」、<sup>62</sup>「通訊」、「通信」、「讀前號」，<sup>63</sup> 以及「談話會」等專欄。如上所述，五四時期《婦女雜誌》的編輯群都不是婦女問題的專家，他們並非站在先知者的立場來領導讀者，而是在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中與讀者一同學習及探討婦女問題，並一起摸索其適用於中國的可能性。當時的《婦女雜誌》經常提供編者與讀者互相交換意見之空間，正說明了該刊並非單方面地將編輯人的意圖提供給讀者的媒體，他們一方面介紹新思潮，另一方面則藉由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認識和婦女有關的新思潮。易言之，《婦女雜誌》之所以重視與讀者交流，不僅是為了掌握讀者對於該刊的反應，更重要的是要透過這樣的互動決定編輯方向。

《婦女雜誌》改革的效果立刻顯現於銷售量，從五四前大約 2,000 至 3,000 餘份，膨脹至 10,000 份以上。<sup>64</sup> 根據《婦女雜誌》的報導，改革後不到二年，「大受一般讀者歡迎，銷數之多，開我國婦女雜誌界的新紀元」，<sup>65</sup> 到 1922

61 具代表性的可列舉如次，「女子服裝的改良」（卷 7 號 9）、「對於婦女雜誌的希望」（卷 7 號 12）、「怎樣救濟失學的婦女」（卷 8 號 3）、「我之理想的配偶」（卷 9 號 11）、「兒時的回憶」（卷 10 號 2）、「我的職業生活」（卷 10 號 6）等。另外，1924 年第 10 卷第 7 號起每期設「討論會」的欄目，讀者與編輯者互相交換對於某個專題的意見。

62 第 7 卷第 9 號起添設。〈編輯餘錄〉，《婦女雜誌》，卷 7 號 9（1921 年 9 月）。

63 「讀前號」的專欄則僅在第 9 卷內添設。〈讀前號欄投稿簡章〉，《婦女雜誌》，卷 9 號 1（1923 年 1 月）；〈讀前號欄投稿諸君鑒〉（廣告），《婦女雜誌》，卷 9 號 11（1923 年 11 月）。

64 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1931 年 1 月）。此外參見章士駁，〈章錫琛先生傳略〉，收入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頁 172。另外，進行改革後的《東方雜誌》每期發行量，也從 15,000 份左右，膨脹為 4 至 5 萬份，從此可知，五四時期商務的改革方向能符合當時讀者的需求。王雲五，〈關於東方雜誌的回憶〉，收入台灣省雜誌事業協會雜誌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雜誌年鑑》（台北：台灣省雜誌事業協會編印，1954），頁 6。

65 〈請讀民國十年婦女雜誌〉（廣告），《婦女雜誌》，卷 7 號 11（1921 年 11 月）。

年時印刷數量增至過去的二倍，「離婚問題號」及「產兒制限號」等專號甚至還再版、三版。<sup>66</sup> 可以說，五四時期《婦女雜誌》的改革取得全面成功。<sup>67</sup>

改革後的《婦女雜誌》銷售數量之所以能夠大量增加，原因在於其編輯宗旨及內容能夠滿足更多讀者的需求。那麼，究竟是何種讀者層的支持，使《婦女雜誌》獲得破天荒的成功？究竟是何種讀者層與編輯群一同主導《婦女雜誌》的思想宗旨？換句話說，改革以後的五四時期《婦女雜誌》到底反映著哪一些社會階層的意見與思想？

在改革方向已上軌道的 1923 年，《婦女雜誌》曾以「我之理想的配偶」為題，徵求過讀者的意見，從報導徵文結果的記事得以窺見當時《婦女雜誌》讀者們的一些面貌。<sup>68</sup> 此次的徵文，自 1923 年 8 月公告至翌月為期一個月間，共獲 155 名讀者的回應，此一應徵數目遠遠超越其他幾次的徵文，可謂再現《婦女雜誌》讀者層的重要資料。<sup>69</sup> 據瑟廬的統計結果，男女人數分別為 129 名及 26 名，換言之，83% 的應徵者為男性。至於應徵者的年齡層，無論男女，皆以 18 歲至 24 歲為最多；職業則以學生與教職員為主，皆為較有機會接觸新知的知識階層。<sup>70</sup>

不僅上海地區，在北京的《婦女雜誌》讀者結構也大致相同。《婦女雜誌》鼓吹婦女解放的論調達到最高點的 1925 年 1 月，北京的《京報》副

66 〈編輯餘錄〉，《婦女雜誌》，卷 8 號 7 (1922 年 7 月)；〈編輯餘錄〉，《婦女雜誌》，卷 8 號 8 (1922 年 8 月)；〈編輯餘錄〉，《婦女雜誌》，卷 8 號 12 (1922 年 12 月)。雖然李明山的研究指出，1930 年代的出版界往往用標榜「再版」的花招來誘惑青年讀者，有時甚至會在初版尚未問世前，便刊出了「再版」、「三版」、「四版」的廣告。李明山主編，《中國近代版權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頁 226-227。如果將這種在 1930 年代前後所盛行的出版商業技巧也列入考量，則《婦女雜誌》中的宣傳文字可能不見得反映實際的出版次數。但是暫且不論《婦女雜誌》上的這些宣傳是否誇張不實，從當時一些讀者調查中可以看出，《婦女雜誌》的影響力確實大幅提高。詳見後述。

67 《婦女雜誌》銷售量增加的趨勢，在章錫琛主編時期皆能維持。〈編輯餘錄〉，《婦女雜誌》，卷 10 號 3 (1924 年 3 月)。

68 瑟廬，〈現代青年男女配偶選擇的傾向〉，《婦女雜誌》，卷 9 號 11 (1923 年 11 月)。

69 〈本誌特別徵文〉(廣告)，《婦女雜誌》，卷 9 號 8 (1923 年 8 月)。

70 實際上編輯群經常指出類似的讀者性別建構，如記者，〈我們今後的態度〉，《婦女雜誌》，卷 10 號 1 (1924 年 1 月)；記者，〈選後〉，《婦女雜誌》，卷 10 號 6 (1924 年 6 月)。

刊發起「青年愛讀書十部」為題的徵文活動，<sup>71</sup> 在一個月的活動時間內，回應的讀者共 307 名。據此份調查的結果，《婦女雜誌》總共獲得 11 票，排名 50，而當時能擠入 50 名內的還有《東方雜誌》、《小說月報》以及《新青年》，所獲得的票數分別是 21 票、21 票和 18 票。此份調查結果，不僅顯示當時《婦女雜誌》所發揮的影響力，更明示這樣的影響皆主要來自何種讀者的支持。<sup>72</sup> 根據該調查結果，《婦女雜誌》的回應者，依其姓名判斷，可知絕大多數為男性，年齡則以 15 歲至 24 歲為主，如下表所示：

編號	46	47	60	86	139	143	157	161	211	231	252
姓名	曲熙	郭敬	張振一	廖仲潛	周九峰	胡玉鮮	吳蘊暉	劉聚奎	胡蘊若	薛先一	無記載
年齡	23	24	22	22	18	16	19	22	15	19	無記載
本籍	山東	江蘇	江蘇 吳縣	江西	京兆	北京	奉天	貴州	北京	山西 稷山	無記載

資料來源：《京報副刊青年愛讀書特刊》，第 1 輯。

由此可知，五四時期《婦女雜誌》的改革的確相當成功。但是，支持此一成功的讀者群，也就是與章錫琛及周建人等編輯人對話，使他們決定該刊編輯方向的主角，並非過去以女子中學生為中心的讀者群。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婦女雜誌》，已成為一群受過西歐新思潮洗禮的年輕男性知識分子共同享有的婦女問題討論空間；而那些附和改革後的《婦女雜誌》的共鳴論調，其實也幾乎都是男性知識分子的聲音。<sup>73</sup>

71 《京報副刊青年愛讀書特刊》(北京：京報出版部，1925)，第 1、2、3 輯。

72 因編輯者認為應徵者「只有三百，所以不妨全數發表出來」，因此每個回條都以全文登載，包括姓名、本籍及年齡等個人資料。《京報副刊青年愛讀書特刊》，第 1 輯。

73 雖然五四時期的《婦女雜誌》中還是有一些由女性投稿者撰寫的文章，但是由於當時一些男性作者，為了適用較低的審稿標準，及迎合讀者特別看重女子著作的心理，往往會冒充女性名義投稿。如果將這一點也列入考量，則真正由女性撰寫的文章篇數可能還要更少。晏始，〈重男輕女與重女輕男〉，《婦女雜誌》，卷 9 號 10 (1923 年 10 月)。

## 四、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再次成為保守派的刊物

雖然改革路線似乎相當成功，但是，當時知識界不見得都贊同《婦女雜誌》所堅持的婦女解放思想，商務印書館的部份領導人對這種激進的編輯路線，也不以為然。<sup>74</sup> 日後章錫琛回顧商務印書館終於決定對《婦女雜誌》進行出版前審查一事時提到：

所內老編輯先生們看了都大為不滿。同時因為《婦女》以前也大量刊登過鴛鴦蝴蝶派的稿件，這時多被拒收，經常受到上海各小報的攻擊。王雲五雖感到頭痛，卻因雜誌銷數增加，還沒什麼表示。但在1925年1月發刊的「新性道德專號」上，由於我寫的〈新性道德是什麼〉和周建人寫的〈性道德的科學標準〉兩文，受到《現代評論》北大名教授陳大齊的抨擊，使王雲五大起恐慌，要我以後把每期排成的清樣送他審查，才能付印。我怕他抽改會延誤出版日期，只允許編成的原稿送審，並要求把我編輯者的名字去掉。沒有得到他的答應，我只得提出辭職。但他只允許我辭去雜誌主編，把我調到國文部；周建人也被調到主編《自然界》雜誌，《婦女》改由杜亞泉的堂弟杜就田主編。<sup>75</sup>

1925年1月出版的「新性道德專號」，可謂《婦女雜誌》激進論調達到最高點的表現，隨之引起一些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的恐慌。譬如，當時著名學者陳百年（陳大齊，1887-1983），曾在《現代評論》為文痛斥《新性道德專號》的主張，「足以為過一夫多妻的生活的人所藉口，足以為一夫多

74 例如，有些中學校禁止女學生閱讀《婦女雜誌》。〈對於學校限制閱讀婦女雜誌的憤慨〉，《婦女雜誌》，卷9號11（1923年11月）。

75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1897-1987）》，頁117。

妻的新護符」。<sup>76</sup> 而且章錫琛在五卅運動當中，以「婦女問題研究會」的名義，參與上海學術團體對外聯合會，<sup>77</sup> 也引起王雲五不滿，因而下令《婦女雜誌》審查之後才能出版，<sup>78</sup> 此舉立刻影響到該刊的編輯方針。自卷 11 號 5 起，章錫琛與周建人二人改以穩健論調撰文。<sup>79</sup> 但是這樣的膠著狀態無法持久，隔三個月的卷 11 號 8，終於公告了章錫琛的辭職。<sup>80</sup> 章錫琛的辭職，意味著編輯方針的再次調整，《婦女雜誌》於此同時向讀者徵求「對於本誌的意見」，暗示此後路線可能大幅更動。<sup>81</sup> 1925 年 9 月，《婦女雜誌》終於迎接新的主編杜就田。此後不僅章錫琛、周建人，就連魯迅、葉聖陶、巴金、茅盾，以及周作人等代表五四新思潮的知識分子們，也不再替《婦女雜誌》撰稿。

但是，《婦女雜誌》再易編輯方針，並不代表五四新思潮追求婦女解放的論調到此停息。章錫琛等婦女問題研究會的成員，開始籌辦另一份婦女刊物《新女性》，以繼承五四時期《婦女雜誌》的宗旨。<sup>82</sup> 1926 年 1 月，《新女性》由婦女問題研究會創刊，到 1929 年 12 月停刊為止，總共出版

76 陳百年，〈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現代評論》，卷 1 期 14(1925 年 3 月 14 日)。

77 婦女問題研究會主要成員為《婦女雜誌》上經常登場的五四新知識分子，以從教育、經濟、法律以及道德四個方面重新探求婦女問題為其設立宗旨。發起人有李宗武、沈雁冰、吳覺農、周作人、周建人、胡愈之、胡學之、倪文宙、夏丏尊、張近芬、張梓生、陳德徵、章錫琛、黃惟志、程婉珍、楊賢江、蔣鳳子等 17 人，皆為當時《婦女雜誌》主要執筆陣容。〈婦女問題研究會宣言〉，《婦女評論》(上海《民國日報》副刊)，期 52(1922 年 8 月 2 日)；〈婦女問題研究會簡章〉，《婦女雜誌》，卷 8 號 8(1922 年 8 月)。在章錫琛辭去《婦女雜誌》的主編以後，由該會創辦《新女性》，繼承五四時代《婦女雜誌》的發刊宗旨。日後的開明書店，則是以該會為前身。郭汾陽、丁東，《書局舊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86。

78 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1931 年 1 月)。

79 章錫琛，〈國民會議與女國民〉，《婦女雜誌》，卷 11 號 5(1925 年 5 月)；章錫琛，〈女學生的人生觀〉，《婦女雜誌》，卷 11 號 6(1925 年 6 月)；章錫琛，〈今後婦女運動的方針〉，《婦女雜誌》，卷 11 號 7(1925 年 7 月)。

80 〈章錫琛啟事〉(廣告)，《婦女雜誌》，卷 11 號 8(1925 年 8 月)。

81 〈十二月號徵文〉(廣告)，《婦女雜誌》，卷 11 號 8(1925 年 8 月)。

82 《婦女雜誌》與《新女性》之間的關係，可參見錢君甸，〈我在開明的七年〉；施蜇存，〈緬懷開明〉；胡愈之，〈紀念開明書店創建六十周年〉；陳伯吹，〈牧歌聲聲一線牽〉，以上皆收入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

48 期。可以說，《新女性》不僅繼承五四時期《婦女雜誌》的宗旨，還延續了當時《婦女雜誌》的人脈及刊物體裁。<sup>83</sup>

1925 年 9 月至 1930 年 6 月擔任《婦女雜誌》主編的杜就田，雖然「已經過時，應該淘汰」，<sup>84</sup> 但是因為他是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主任杜亞泉 (1873-1933) 的堂弟，不能解僱，只能調換到某些部門擔任一些雜務，讓商務也時感頭疼。從商務後來決定由他擔任《婦女雜誌》主編一事，可知商務當時如何看待《婦女雜誌》此份刊物的地位。此後直到 1930 年，由「頭腦不清楚」的杜就田主導的《婦女雜誌》，<sup>85</sup> 不僅變為錯漏字滿篇的刊物，<sup>86</sup> 甚至往往不能如期出版。<sup>87</sup> 初任主編時，杜就田以「農隱」之筆名，將幾篇有關實用科學或藝術的簡單文章發表於《婦女雜誌》。<sup>88</sup> 除此之外，只有在他主持的「攝影術顧問」專欄，或在展示自己的篆刻版面

83 章錫琛指出，《新女性》的銷售數達 3,000 至 5,000 份，相較於《婦女雜誌》1924 年當時的銷量有 7,000 份，《新女性》可謂獲得相當多的讀者。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 (1931 年 1 月)；Jacqueline Nivard，“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 50. 另外，如《申報》20,000 份、《新聞報》25,000 份、《時報》5,000 份等，1925 年上海地區報紙類的銷售數目也可參考。小關信行，《五四時期のジャーナリズム》(京都：同朋舍，1985)，頁 119-121。

84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1897-1987)》，頁 117。

85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1897-1987)》，頁 117。

86 〈編輯室贅言〉，《婦女雜誌》，卷 12 號 8 (1926 年 8 月)。

87 當時的《婦女雜誌》經常登載編輯部聲明，對該刊的延期出版，向讀者表示歉意。〈編輯室贅言〉，《婦女雜誌》，卷 12 號 8 (1926 年 8 月)；〈編輯室附告〉，《婦女雜誌》，卷 13 號 2 (1927 年 2 月)；〈輯後贅言〉，《婦女雜誌》，卷 15 號 1 (1929 年 1 月)；〈輯後贅言〉，《婦女雜誌》，卷 15 號 2 (1929 年 2 月) 等。雖然當時的延期出版暴露編輯人杜就田的無能，但實際上，延期出版現象並非杜就田時代所獨有，章錫琛主編時代的如期出版，反倒是相當特別的現象。見〈本社特別啟事二〉(廣告)，《婦女雜誌》，卷 7 號 6 (1921 年 6 月)；〈編輯餘錄〉，《婦女雜誌》，卷 9 號 11 (1923 年 11 月)。

88 日後章錫琛回顧云，杜就田在《婦女雜誌》上「連結發表幾篇短文，鬧了不少笑話」。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1897-1987)》，頁 117。

上，才能看見「杜就田」的名字。<sup>89</sup> 杜就田主編時代的《婦女雜誌》，稿源多半都只能依靠讀者寄來的投稿，<sup>90</sup> 可見當時的《婦女雜誌》不僅被商務忽略，甚至連主編也棄之不顧。那麼，此時《婦女雜誌》具體的內容及體裁有何變化？

就其內容而言，此時的《婦女雜誌》主要講家庭在社會上的意義，或討論女子教育應注重的課程內容，特別以職業教育為核心。<sup>91</sup> 雖然它似乎仍以籌備專號及讀者徵文的方式，繼承五四時期《婦女雜誌》的體裁，但不論專號或徵文，其主旨皆與以往有大幅變化。特輯專號的主題，則若非專門討論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就是提供觀賞的一些美術品，如「美術專號」(卷 12 號 1)、「生活號」(卷 14 號 1、2)、「婚姻號」(卷 14 號 7)、「淺識薄技號」(卷 15 號 1)、「教育部全國美術展覽會特輯號」(卷 15 號 7)、「婚前與婚後號」(卷 15 號 10) 等。另外，讀者徵文題目也有所轉變，其中較常見的題目有一般生活當中的經驗談，或強調家庭中的美談，以及欣賞自然美或藝術品等。

如上所述，就五四新知識分子的眼光審視之，《婦女雜誌》論調的確走向了「保守反動」路線。<sup>92</sup> 但是，對於曾被這些男性新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另一種讀者群而言——可能絕大多數是女性——五四時期的《婦女雜

89 杜就田除了因為協助杜亞泉，為商務印書館編輯教科書而名留青史以外，還是一位著名的篆刻家。王崇人主編，《中國書畫藝術辭典》(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篆刻卷，頁 194。例如上海各類小報上也能看見杜就田篆刻的廣告，如〈杜就田書畫篆刻〉(分類廣告)，《大美報》，民國 27 年 7 月 5 日。

90 《婦女雜誌》當時不僅每期都設有二、三種徵文專欄，還以「徵文預告」的方式呼籲讀者投稿。雖然章錫琛時代的《婦女雜誌》也同樣重視讀者投稿，但其性質並不相同。如果說章錫琛時代的讀者投稿是編輯人與讀者之間的交流管道，杜就田時代的投稿專欄則未成為兩者之間的橋樑。不僅編輯人對於讀者投稿幾乎沒有任何評論，讀者投稿本身的內容也不盡然是討論性質的，而主要著重在描述個人的生活見聞與感觸。

91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p. 42-43.

92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 42.

誌》，不僅「歐化色彩太重」，而且它所採用的「白話比文言尤其難懂」。<sup>93</sup>甚至有些讀者認為「本誌討論過了許多問題」，但是只能「感到有一種討論壓卷的意味」。<sup>94</sup>換言之，一批男性知識分子離開後的《婦女雜誌》，被不同於以往的讀者群要求「對於怎樣養成『良妻賢母』的問題多加討論」，並建議「一以祛除抱獨身主義的謬見；一藉以指導婦女」，<sup>95</sup>同時再加有趣味的插圖，以增加藝術品味。<sup>96</sup>改由杜就田為主編的《婦女雜誌》，雖然暴露出主編者的無能，但是起碼可謂反映出部份讀者群的要求。杜就田也向讀者確認《婦女雜誌》的編輯宗旨云：

屢蒙函詢本刊主意，本刊的主意很平常，略言之，即注重婦女修養及安慰的種種，以養成健全的社會與家庭，更佐以有趣味的藝術及短篇文字或圖畫，為欲滋潤人間枯燥的生活。<sup>97</sup>

到目前為止，《婦女雜誌》再次的路線變化是否導致銷售量的增減，還無法從文獻中得知。但是徵諸1920年代後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雜誌中，有十種以上被停刊的事實，<sup>98</sup>可推測當時的《婦女雜誌》至少能維持一定程度以上的銷量，才能免於被停刊。根據該刊上的報導，《婦女雜誌》對於讀者的吸引力，倒並沒有很大的變化。譬如，該刊幾乎每期都專設一個

93 竹友，〈我對於本誌的意見二〉，《婦女雜誌》，卷11號12(1925年12月)。

94 徐學文，〈我對於本誌的意見一〉，《婦女雜誌》，卷11號12(1925年12月)。

95 趙棟臣，〈我對於本誌的意見七〉，《婦女雜誌》，卷11號12(1925年12月)。

96 徐學文，〈我對於本誌的意見一〉；解世芬女士，〈我對於本誌的意見三〉；素芬，〈我對於本誌的意見四〉；斌，〈我對於本誌的意見五〉；左企，〈我對於本誌的意見六〉，以上皆見於《婦女雜誌》，卷11號12(1925年12月)。章錫琛辭職公告的「我對於本誌的意見」徵文活動的結果，被採用的六篇投稿中，有五篇指出應增加圖畫或色彩等藝術品味，從此也能窺見五四時期的《婦女雜誌》所具有的刊物特色之一。實際上，章錫琛主編時代的《婦女雜誌》經常被讀者批評缺乏藝術品味。如汪汝幹，〈對於本誌的希望(一)〉，《婦女雜誌》，卷9號7(1923年7月)；〈編輯餘錄〉，《婦女雜誌》，卷9號11(1923年11月)。

97 〈編輯室報告〉，《婦女雜誌》，卷14號2(1928年2月)。此外，1925年12月的卷頭廣告指出，該刊同仁「務使婦女雜誌不為少數人所專有，成一『婦女忠實的良伴』，或為『有趣味的軟性讀物』。」此一聲明宣示了相同的編輯理念。〈明年婦女雜誌的旨趣〉(廣告)，《婦女雜誌》，卷11號12(1925年12月)。

98 戴仁(Jean-Pierre Drege)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頁113-114。

「徵求」的廣告欄目，登載讀者們徵求絕版或舊號之《婦女雜誌》的廣告。甚至《美術專號》的那一期，也屢次被讀者們要求再版。<sup>99</sup>

從杜就田時代主編的《婦女雜誌》的影響力變化看來，與其說是在於「量」上，毋寧說在「質」上；換言之，讀者群性別建構開始出現顯著變化。而自該刊卷末的「醫事衛生顧問」專欄，也能確認《婦女雜誌》讀者群結構在性別層次上的變化。此一專欄的運作，先後橫跨章錫琛與杜就田主編的兩個不同時代；從投書者的性別比率觀之，可發現，自杜就田時代以後，女性比率有大幅增加的趨勢。<sup>100</sup> 從上海在 1930 年實行的「女學生愛讀書籍調查」結果，也確認《婦女雜誌》重新獲得女性讀者的支持。<sup>101</sup> 此份調查用填表的方式進行，並以復旦大學等上海地區八所學校的女學生為對象，要求讀者提出一份愛讀書的書單。回收的 254 張有效回條當中，《婦女雜誌》獲得 14 票，僅次於第一名《古文觀止》的 20 票，以及第二名《紅樓夢》的 15 票，居第三位。<sup>102</sup> 暫且不論是否有男性讀者，至少可知當時的《婦女雜誌》是女學生們最喜愛的讀物之一。

99 〈編輯室的報告〉，《婦女雜誌》，卷 12 號 7 (1926 年 7 月)；〈編輯室贅言〉，《婦女雜誌》，卷 12 號 8 (1926 年 8 月)。另外，〈醫事衛生顧問〉欄目的投稿數目向來維持增加的趨勢，從此亦窺見《婦女雜誌》的銷量並沒有很大的變動。參見「医事衛生顧問の歴年相談件数」，引自張哲嘉，〈「医事衛生顧問」について〉，收入村田雄二郎主編，《『婦女雜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另一種旁證，則為《婦女雜誌》停刊後讀者們的反映。參見姚黃心勉，〈女子書店的第一年〉，《女子月刊》，卷 1 期 2 (1933 年 4 月)；陳周碧霞，〈希望你們照著發刊宗旨去做〉，《女子月刊》，卷 1 期 2 (1933 年 4 月)；林燦霞，〈使牠在文化史上得佔光榮燦爛的一頁〉，《女子月刊》，卷 1 期 5 (1933 年 7 月) 等。

100 參見「医事衛生顧問相談者の性別分布」，引自張哲嘉，〈「医事衛生顧問」について〉，收入村田雄二郎主編，《『婦女雜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

101 周振韶，〈女學生愛讀的書籍〉，《婦女雜誌》，卷 17 號 2 (1931 年 2 月)。雖然該報導登載於《婦女雜誌》的時間，為杜就田已辭去主編之職的 1931 年 2 月，但是實行調查的時間，則為 1930 年 11 月，可以說此份調查結果反映杜就田時代的《婦女雜誌》。

102 除了《婦女雜誌》以外，第三名還有《福爾摩斯偵探案》、《愛的教育》，以及《三國志演義》等。另外，獲得 10 票以上支持的書籍，有《學生雜誌》(11 票) 以及《國文》(10 票)。

## 五、停辦前夕到尾聲

當 1930 年杜就田離開商務，<sup>103</sup> 《婦女雜誌》不得不再一次更換主編，如同前兩次的人事異動一般，此次更迭也直接導致刊物性質的變動。從第 16 卷第 7 號起擔任《婦女雜誌》主編的葉聖陶 (1894-1988)，曾編輯過《小說月報》，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主要領導者之一。<sup>104</sup> 此外，陶希聖 (1899-1988) 及金仲華 (1907-1968) 等受五四新文化洗禮之新知識分子，也一同加入《婦女雜誌》的新編輯陣容。在 1925 年後一度離開《婦女雜誌》的新知識分子，如巴金、章錫琛、周建人與葉淺予等人，也重新成為撰稿者。葉聖陶甚至在他負責編輯的第一期《婦女雜誌》中，登載了一篇章錫琛的文章，<sup>105</sup> 彷彿在暗示此後《婦女雜誌》的路線將回歸於章錫琛主編時代，重現該雜誌在五四時期所具有的風貌。

可是，綜觀葉聖陶主編時代的版面，並不足以稱為五四的「復興」(revival)。<sup>106</sup> 不只是因為此一階段的改革論調遠遠不及五四時代的成就，而且因為當時《婦女雜誌》仍然繼承了杜就田時代的執筆群、<sup>107</sup> 徵文題目，

103 關於杜就田辭職始末及繼任人選的遴聘問題，《婦女雜誌》上僅見辭職公告一則：「就田已辭去婦女雜誌編輯事務，至六號編成，即離其職。此後關於投稿及各種詢問事件，請直接與婦女雜誌社接洽，請弗由就田轉交，以免延誤。」〈杜就田啟事〉(廣告)，《婦女雜誌》，卷 16 號 5 (1930 年 5 月)。據鄭彭年日後的描述，「杜亞泉」是被商務開除，後任人選也由商務安排。雖然鄭彭年將「杜就田」寫成「杜亞泉」，但是由此至少可確認，杜就田不誠實的工作態度，使商務決定更換主編。鄭彭年，〈宋慶齡和她的助手金仲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頁 57。

104 葉聖陶，〈追念金仲華兄〉，收入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頁 132；葉聖陶，〈我和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1897-1987)》，頁 300。

105 章錫琛，〈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主義〉，《婦女雜誌》，卷 16 號 7 (1930 年 7 月)。

106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p. 43.

107 譬如，以程瀚章、徐學文及陳伯吹署名的文章，皆見於杜就田時代以及葉聖陶時代的《婦女雜誌》上。

以及編輯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等。<sup>108</sup> 更重要的是，葉聖陶並沒有正式表明就職後的編輯方向，也沒有對該刊的過去進行反省或批判。

雖然五四新知識分子的確使《婦女雜誌》脫離杜就田時代，但他們卻不一定要讓它重現五四時期的光采，也不積極爭取將《婦女雜誌》重新變為自己主要言論空間。對他們而言，與其在一份被「不開明」的商務印書館掌握的老刊物上展現自己的思想，<sup>109</sup> 不如開闢另一個言論空間，以取代五四時期《婦女雜誌》所提供的討論場域。這時，開辦五年多的「開明書店」，<sup>110</sup> 已成為五四知識分子的新園地，並開始從商務印書館吸收人才。1931 年 3 月，擔任《婦女雜誌》主編還不到一年的葉聖陶，離開商務印書館，加入開明書店的《中學生》編輯群。<sup>111</sup> 不只葉聖陶，其他主要的五四知識分子，也同樣選擇開明書店，而再次從《婦女雜誌》上消失。<sup>112</sup>

如果說五四新知識分子的回歸，並未使《婦女雜誌》版面徹底改變，那麼他們的再次離開，也沒有留下如上次那樣明顯的跡象。1931 年 4 月，

108 杜就田時代的讀者徵文，公佈題目後大約隔半年收稿截止，再過兩個月刊登當選作品。因此，杜就田辭職時，《婦女雜誌》已公佈未來八個月份的徵文題目。葉聖陶就任後，不僅沒有將過去題目廢止，新增的徵文題目旨趣也不見得與上一代有差別，譬如「當我們有了小孩的時候」、「女教師的話」(卷 16 號 8 公佈)；「我的學校生活」、「我的配偶」(卷 16 號 9 公佈)；「出了中等學校」、「女工的情況」、「書我所認為的新女子者」、「暑期的生活」(卷 16 號 10 首次公佈)；「關於投考學校」、「我所希望的生活」(卷 16 號 12 公佈)；「秋令隨筆」、「小家庭生活的經驗」(卷 17 號 1 公佈)；「對於時髦女子的感想」、「風雨晦明的時候」(卷 17 號 2 公佈)；「認識男朋友的益處」、「旅行雜感」(卷 17 號 3 公佈)。另外，雖然卷 17 號 1 起新增「通信」一欄，但是編輯人仍然堅持「對於這種來信，一向不曾作復」的方針，僅發表讀者方面的來信，並不做任何評論或回答，不同於五四時代，此一專欄並沒有成為與讀者之間的交流管道。〈通信〉，《婦女雜誌》，卷 17 號 1 (1931 年 1 月)。

109 郭汾陽、丁東，〈書局舊蹤〉，頁 86。

110 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頁 315。

111 葉聖陶，〈我和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1897-1987)》，頁 300。

112 《中學生》創刊當初的版面當中，就可以看到這些過去《婦女雜誌》的主要撰寫者；如編輯陣容中的章錫琛與夏丏尊，另外成為撰寫者的葉聖陶、陶希聖、巴金、倪文宙等。

《婦女雜誌》改由楊潤餘（1902-?）擔任主編，<sup>113</sup> 但也有些資料說是由前任編輯助理金仲華升為主編，<sup>114</sup> 似乎在名義上的主編楊潤餘之下，另有金仲華擔任編輯實務。姑且不論楊潤餘是否只是掛名而已，從她過去的經歷與人際關係來看，她也應該會贊同金仲華可能採取的編輯路線。楊潤餘曾在1920年加入湖南「新民學會」，是該會首位女會員之一，並曾參與過五四愛國運動。<sup>115</sup> 不僅她本身可以說是五四知識分子的一員，她的嫂嫂、著名的留英女作家袁昌英（1894-1973），也曾在章錫琛時代幾次出現於《婦女雜誌》上。<sup>116</sup> 但是由於楊潤餘擔任主編的期間過短，編輯人之間的關係、編輯方針及其讀者層的面貌等問題，皆難以從版面上考見。

改由楊潤餘為主編的《婦女雜誌》僅出版八期，便因商務印書館在1932年1月28日淞滬戰爭中被炸毀而被迫停刊，<sup>117</sup> 並從此拉下長達十七年歷史的帷幕。當時商務印書館遭受莫大的損害，各雜誌的損失尤其嚴重，幾乎所有雜誌都不得不停辦，包括《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英語週刊》、《少年雜誌》、《小說月報》、《英文雜誌》，以及《自然界》等。<sup>118</sup> 經過半年餘的整頓，商務印書館在1932年8月宣布復業；同年10月，《東方雜誌》、《英語週刊》、《兒童世界》與《兒童

113 楊潤餘，1902年出生於湖南，1921年7月以「法華教育會」的公費留學生，與羅振英、潘玉良等11名同赴法，10月即入里昂中法大學文科。李塵生，〈1921-1946年里昂中法大學海外部同學錄〉，《歐華學報》，號1(1983年5月)。1929年返國後，於安徽大學執教鞭，從事法國文學研究。〈女子書店股分有限公司發起人〉(廣告)，《女子月刊》，卷1期5(1933年7月)。

114 譬如金炳亮，〈金仲華期刊編輯生涯述評〉，《編輯之友》，1994年第1期，頁64；金立勤，〈金仲華的編輯生涯〉，《新文化史料》，1998年第3期，頁26等；鄭彭年，〈宋慶齡和她的助手金仲華〉，頁64等。

115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卷上，頁99。

116 袁昌英不僅曾為章錫琛時代的《婦女雜誌》撰寫有關婦女參政運動的文章，還把自己的結婚攝影登載於該刊。楊袁昌英，〈敬告新當選的女議員〉，《婦女雜誌》，卷8號7(1922年7月)；楊袁昌英，〈中國婦女參政運動之前途〉，《婦女雜誌》，卷9號1(1923年9月)；〈楊端六先生與袁昌英女士結婚攝影〉，《婦女雜誌》，卷8號1(1922年1月)。

117 何炳松，〈商務印書館被燬紀略〉，《東方雜誌》，卷29期4(1932年10月16日)。

118 戴仁(Jean-Pierre Drege)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頁110-114。

畫報》復刊，但《婦女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少年雜誌》，以及《自然界》等刊物，則仍暫時停刊。<sup>119</sup> 不過，《東方雜誌》從復刊第一期起就新增「教育欄」與「婦女與家庭欄」兩項專欄，以替代《教育雜誌》及《婦女雜誌》。<sup>120</sup> 「婦女與家庭欄」，不僅由《婦女雜誌》停刊當時的編輯人之一金仲華主持，還繼承其歷史最悠久的連載專欄「醫事衛生顧問」。「婦女與家庭欄」及《婦女雜誌》之間的連續性，由此可見一斑。<sup>121</sup> 但和其他五四知識分子一樣，金仲華也在不久之後（第 31 卷第 15 號）辭去商務印書館的職務，加入開明書店。<sup>122</sup> 雖然「婦女與家庭欄」一直持續到 1939 年 8 月第 36 卷第 13 號，但相對於以「教育欄」為基礎，而得以在 1934 年復刊的《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再也沒有恢復成獨立刊物，「婦女與家庭欄」則因經費不足而被迫停止。<sup>123</sup>

## 六、給女人？談女人？

今日把一些刊物分類成所謂「婦女期刊」的起碼條件，不外乎是設定以「女性」為其主要讀者群。<sup>124</sup> 對於近代中國史上的此類婦女期刊的研究，

119 〈東方雜誌社啟事三〉（廣告），《東方雜誌》，卷 29 期 4（1932 年 10 月 16 日）。

120 次號的第 29 卷第 5 號起，《東方雜誌》輪流刊登此兩項專欄。由於當時《東方雜誌》為半月刊，因此每月出一次「婦女與家庭欄」。

121 當初「婦女與家庭欄」的文章，大部份用「孟如」或「仲華」等筆名，由金仲華撰寫。金立勤，〈金仲華著作年表〉，收入鄭彭年，《宋慶齡和她的助手金仲華》，頁 291。

122 〈金仲華啟事〉（廣告），《東方雜誌》，卷 31 期 13（1934 年 7 月 1 日）。

123 〈啟事〉（廣告），《東方雜誌》，卷 36 期 17（1939 年 9 月 1 日）。

124 台灣的現行中文圖書分類法，並無「婦女期刊」此一項目，僅有「家庭婦幼期刊」（published for family）。但是，此一分類法基礎之「杜威十進分類法」，則將「for women and family use」的期刊分類成「婦女類・家庭類」。教育部圖書館事業發展委員會中國圖書分類標準化問題研究小組編訂，《現代圖書分類法》（台北：教育部，2001），頁 20；杜定友編，《杜氏圖書分類法》（上海：中國圖書出版社，1935），冊中，頁 80。至於中國大陸方面，則將「中國期刊・連續性出版物」僅按期刊名稱排序而已，並不進一步加以分類。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0），頁 656。

也多半基於此一條件而進行，並且往往未經嚴密論證，便賦予該類刊物某種史料性質——以之代表當時婦女的情況。針對《婦女雜誌》的既有研究也不例外。且由於《婦女雜誌》的巨大影響力與銷售規模，使它經常被視為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基本史料。然而，過去研究總傾向於依據五四時期《婦女雜誌》所呈現的激進論調及其強大的影響力，而未仔細分析這份刊物背後讀者群的性別、年齡、階級層，是否也為這份刊物帶來另一種影響，便歸納出「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婦女論述經歷了高度成長」這類的結論。

身為當時最大規模出版組織的商務印書館，對於發刊期長達十七年的《婦女雜誌》，基本上只要它能夠確保一定程度以上的銷售利潤，同時也不造成對商務印書館的困擾，就在刊物的體質等其他部份，保留其能變化的餘地，如編輯方針、體裁、內容、執筆人物，甚至讀者等。左右《婦女雜誌》刊物性質的主要因素，則為時代的潮流以及主編思想傾向。商務印書館對於《婦女雜誌》的關心，實際上僅因時制宜更迭主編而已。而隨著不同主編的不同志向，《婦女雜誌》的刊物性質也經歷數次脫胎換骨。《婦女雜誌》刊行期間所經歷的變化，不只在於編輯方式與雜誌內容，更包括主編、執筆者及讀者等圍繞著該刊的人群的變化。1921年章錫琛就任主編，以及1925年改由杜就田為主編，不僅是編輯人的替換，並且搖撼了整個刊物流通的循環生態，包含讀者、執筆者、主編，還有刊物的內容。

綜觀《婦女雜誌》所呈現的婦女論述之水準，確實以五四時期為最高點。但這並不足以構成論證整個中國社會的婦女論述亦以五四時期為巔峰的充分條件，因為在五四時期主導該刊的婦女論述的男性知識分子，不盡然也主導五四時期前後的《婦女雜誌》。換言之，橫跨五四時期，《婦女雜誌》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或性別，並未具有連續性。1915年創刊的《婦女雜誌》，依循男性主編的觀點，叮嚀婦女們應作「賢妻良母」；到五四階段時，則藉由主編的更迭，搖身一變成為男性年輕知識分子討論婦女問題的園地。

最近的研究成果說明，五四時期由男性知識分子進行的激進婦女論述，與其說是替代女性們追求新的女性形象，毋寧謂其主要通過新女性形

象來追求新時代的自我。<sup>125</sup> 如果繼承此研究理念，則五四時期的《婦女雜誌》中，作為討論課題的「婦女」，也不見得真是女性；其中所呈現的婦女形象，只不過象徵男性們所追求的自我形象。《婦女雜誌》長達十七年的發行時間中，五四時期的婦女論述雖然攀至最高峰，但是當時大多數的中國婦女，不僅並非《婦女雜誌》的主要讀者或執筆者，甚至不見得是被討論的主體。

125 參見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

- 《大美報》(上海)，1938。
- 《大陸》(上海)，1902。
- 《女子月刊》(上海)，1933。
- 《女子雜誌》(上海)，1915。
- 《女學報》(東京)，1903。
- 《中華婦女界》(上海)，1915。
- 《中學生》(上海)，1931。
- 《少年中國》(上海)，1919。
- 《民國日報》(上海)，1921。
- 《江蘇》(東京)，1903。
- 《京報副刊青年愛讀書特刊》(北京)，1925。
- 《東方雜誌》(上海)，1932-1939。
- 《時事新報》(上海)，1922。
- 《婦女時報》(上海)，1915。
- 《婦女雜誌》(上海)，1915-1931。
- 《現代評論》(北京)，1925。
- 《新女性》(上海)，1926-1929。
- 《新潮》(北京)，1919。
- 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編，《我與開明》。上海：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卷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 台灣省雜誌事業協會雜誌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雜誌年鑑》。台北：台灣省雜誌事業協會編印，1954。
-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香港：三聯書店，1981。
- 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 (1897-1987)——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 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 (1897-1992)——我和商務印書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卷上、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 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 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
- 魯迅，《魯迅全集》，卷 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 謝菊曾，《十里洋場的側影》。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

## 二、專書

- 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0。
-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
- 王崇人主編，《中國書畫藝術辭典》，篆刻卷。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
- 李立明，《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香港：波文書局，1977。
- 李明山主編，《中國近代版權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
- 杜定友編，《杜氏圖書分類法》，冊中。上海：中國圖書服務社，1936。
- 汪家熔，《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 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張元濟、陸費逵、王雲五的文化貢獻》。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
- 周敘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
- 教育部圖書館事業發展委員會中國圖書分類標準化問題研究小組編訂，《現代圖書分類法》。台北：教育部，2001。
- 曹正文、張國瀛，《舊上海報刊史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3。
- 郭汾陽、丁東，《書局舊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 曾健戎、劉耀華編，《中國現代文壇筆名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
- 楊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 鄭彭年，《宋慶齡和她的助手金仲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 戴仁 (Jean-Pierre Drege) 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1949》(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 小關信行，《五四時期のジャーナリズム》。京都：同朋舍，1985。
-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三、論文

- 呂美頤、吳效馬，〈婦女解放思潮的興起與發展〉，收入吳雁南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 1840-1949》，卷 2。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李塵生，〈1921-1946 年里昂中法大學海外部同學錄〉，《歐華學報》，號 1，1983 年 5 月。
- 金立勤，〈金仲華的編輯生涯〉，《新文化史料》，1998 年第 3 期。
- 金炳亮，〈金仲華期刊編輯生涯述評〉，《編輯之友》，1994 年第 1 期。
- 芮和師，〈以詞章擅場的小說名家 — 王西神評傳〉，收入欒梅健編校，《哀情巨子 — 鴛鴦派開山祖 — 徐枕亞》。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
- 徐楚影、焦立芝，〈中國近代婦女期刊簡介 (1898-1918)〉，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卷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徐楚影、陳新段，〈婦女雜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卷 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趙淑萍，〈民國初年的女學生 (1912-1928)〉。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鮑家麟，〈晚清及辛亥革命時期〉，收入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 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 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及其活動與影響〉，《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1999 年 8 月。
- 謝曉霞，〈商業與文化的同構 ——《小說月報》創刊的前前後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 年第 4 期。
- タニ・E・バーロウ，〈中国のフェミニズムにおける「女性」の問題 — 1920、30 年代の優生学的言説 —〉，《思想》，號 949，2003 年 5 月。
- 前山加奈子，〈《婦女園地》とその「園丁」たち〉，《駿河台大學論叢》，號 7，1993。
- 前山加奈子，〈女性刊行物全体からみた《婦女雜誌》— 近現代中国のジェンダー文化を考える一助として —〉，收入村田雄二郎主編，《『婦女雜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東京：研文出版，2004。
- 若林正文，〈近代中国における綜合雑誌 —《東方雜誌》解題 —〉，《外語研究紀要》(東京大学教養学部)，卷 26 號 4，1978。
- 張哲嘉，〈「医事衛生顧問」について〉，收入村田雄二郎主編，《『婦女雜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東京：研文出版，2004。

Nivard, Jacqueline.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 1984.

# Of the Women, By the Women, or For the Women? –Rewriting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Jungwon Jin

## Abstract

Women’s magazines in modern China, a side-product of the emerging free press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vide in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women in modern era. However, their value i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 extent of historical content in these magazines themselves, but due to the paucity of other historical sources on Chinese women. Thu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published by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from 1915 to 1931, has become a critical source for moder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especially fo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ra.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the *Ladies’ Journal* reached its apogee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Fourth Movement, which was used to validate the value this magazine as a historical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during this era. However, this assumption overlooks the two critical points: first, that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a journal (such as readership or authors) can change, and, second, that any historical conclusions drawn from specific sources need to be

verified by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sources themselves. Since each historical source reflects only a fraction of a whole society, the changes portrayed in one specific source cannot be extrapolated to explain the “zeitgeist” without verifying of the continuity of its soci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the *Ladies' Journal* over its seventeen-year existence through its authorship, readership, publisher's attitudes, and circulation. This allows us to determine more precisely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ra.

**Key Words:**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Commercial Press (Shangwu Yinshuguan), gender in readership, gender in editorship, Hu Binxia, Zhang Xichen